

美国国务院官员罗伯特·曼宁 (Robert Manning) 有云：“朝鲜实力软弱，但利用得非常充分。”不过，早在1950年秋季国家被占领时，他们就已经这么做过：在中国军队的援助下，他们成功地从热火中取出了自己的栗子。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然而，我并不认为美国人已经读懂或想要读懂这个故事。

##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 视差

[美] 布鲁斯·卡明斯 著  
李茂增 译

---

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 视差

---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美] 布鲁斯·卡明斯————— 著

李茂增—————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by Bruce Cumings

© 1999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 (美) 卡明斯著；李茂增译. -- 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

ISBN 978-7-108-05563-7

I. ①视…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美国—对外关

系—东亚—研究 IV. ① D871.22 ② D83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9721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内文设计 朴 实 张 红

责任校对 张 睿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 1 版

2016年10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 数 292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46.00元

## 目 录

平装本前言\_\_\_\_\_ 1

致 谢\_\_\_\_\_ 15

导 论\_\_\_\_\_ 17

## 第一章

考古学、血统、突现：美国神话与东亚现实\_\_\_\_\_ 28

## 第二章

东风，雨 红色风暴 黑雨：

美日战争，开端和终结\_\_\_\_\_ 61

## 第三章

殖民的形态与变体：朝鲜、中国台湾和越南\_\_\_\_\_ 104

## 第四章

美国与东亚的公民社会及民主\_\_\_\_\_ 139

## 第五章

核不平衡威慑：美国的监管体制与朝鲜核计划\_\_\_\_\_ 171

## 第六章

世界撼动中国\_\_\_\_\_209

## 第七章

边界位移：国家、基金会、冷战中及冷战后的  
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研究\_\_\_\_\_233

## 第八章

东亚与美国：双重视域与霸权的出现\_\_\_\_\_274

注 释\_\_\_\_\_301

1999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作者的初衷是，对东亚—美国关系进行理论化、历史化的分析，而避免时事评论式的写法，至少不要让它被铺天盖地、朝来暮往的事件淹没，沦为明日黄花。当时，适逢世纪末和千禧年，这促使我更坚定地采取历史化方法，深入过去寻找线索和先例，以帮助我们理解现时代每天都蜂拥而来的种种事件。本书更深远的目的则是既从东亚一方，也从美国一方探寻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美国进行自我反思：不仅反思其对外政策，更反思其行为、假设，同时也反思跌宕起伏的情节赖以发生的美式舞台布景。

现在，已是新世纪、新千年，但我们距离1999年仍很切近；我们依然处身于从可以明确定义的20世纪向着崭新的、截然不同的，但尚不能把握的某物转折的时代。由于距离太近，在美国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的灾难发生之前，美国和东亚的关系只有些微改变。中国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一丝不苟，下足了功夫，终于看到了世贸组织美洲和欧洲看门人同意的眼神。2000年，一位被控谋求“台独”的人获得了台湾的权杖，但陈水扁对于推动台湾岛独立的兴趣，似乎远比不上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对他的刺激。在经历了1995年、1996年与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看上去开始改变做

法，以更审慎的克制（当然，只是相对而言）表明了北京对台湾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深化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在经历了飞速发展之后，中国日益成为东亚最具资本主义活力的地区。

不出所料，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因子和一个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迅猛崛起，让美国国会中保守的共和党人益发活跃，他们开始谋求将对克林顿夫妇无休无止的调查（调查引发了一场不成功的弹劾）进一步扩大，对据说遍布于克林顿政府中的中国间谍进行搜捕。结果是，大部分毁谤落在了生于台湾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身上，共和党人指控他泄露了美国全部核武库的秘密。按照美国众议院某委员会 1999 年 5 月提交的《考克斯报告》，被李博士和其他中国间谍窃取的秘密包括“7 种美国热核弹头的绝密信息，其中包括当前正在美国弹道导弹工厂装配的所有热核弹头”<sup>1</sup>。在为该报告的出版本撰写的序言中，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指控克林顿—戈尔政府“自朱利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s）向苏联泄露原子弹秘密以来，使国家安全遭受了最严重的威胁”<sup>2</sup>。这绝非共和党人试图从又一个“谁失去了中国”的妄想中谋求政治利益的孤例。

然而，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所谓邪恶计划不过是一个妄想。《考克斯报告》墨迹未干，共和党人就撇清了与“自美国国会成立以来最振聋发聩的报告”的牵连。<sup>3</sup> 他们非但没有对报告所揭示的背叛行为采取任何行动，反而完全弃之不顾；很快，这些罪责就被遗忘了（对克林顿的弹劾庶几相似）。被指控出卖秘密的克林顿政府很快就感受到了自由，并为将功能强大的美国计算机出口到中国提供了长期有效的清关措施，这一举措立即得到了一位名叫乔治·布什的共和党人的击节称赞。李博士被控案也以联邦调查局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不符合程序而如所预料地大事化小。李博士被判有罪，罪名是将为数很少的涉密材料不适当地存储到了自己的计算机上。许多报道认为他是美国核实验室中所在多有的

种族定性的牺牲品。与此同时，中国却从未部署过哪怕一枚美国设计的核弹头——不管是偷来的、剽窃的，还是用别的什么方式得到的。尽管如此，显而易见，一个叫作中国的地方依然为美国任何一项可以想见的计划——不管这个计划有多么野蛮、多么愚蠢——提供了便于进行罗夏测验<sup>\*</sup>的墨迹。

依然是世界在撼动中国，而不是相反。也许中国的确发展迅猛，但它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其庞大人口的三分之二依然在从事农业生产，而其中大多数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经过了十年发展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指数依然低于西方的 10%；中国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于伊朗以及最近这场战争之前的伊拉克和科索沃。以科技支出在 GDP 中的比重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排在世界第四十位（在巴西之后）<sup>4</sup>，而其国防开支则比邻近的本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总和略高（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总和为三百五十亿美元，中国大陆的在三百亿美元至五百亿美元之间）。一般来说，中国看上去是在追随日本的新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我在第六章将对此展开讨论，但中国同样欢迎数额巨大的海外直接投资（DFI）。极低水平的海外直接投资堪称日本模式的鲜明标志，而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海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者。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有许多无法概括的复杂面相，然而西方决策者却执意要将中国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日本”的种种迹象消灭于萌芽之中。他们对韩国之所为，也如出一辙。

1997 年末，1950 年代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了数额惊人的紧急救助款（约七百亿美元）。就在这场危机中，韩国的公民社会将长期持不同政见者金大中推选为总统。美国的权威专家们认定这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一个错误选择，《华尔街杂志》

---

<sup>\*</sup> 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通过让被测者解释墨水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的测验。——译注



甚至公开对之进行抨击。毫无疑问，随着金大中这样的“激进分子”上台，强势的韩国工会必将破坏一切严肃认真的改革努力。<sup>5</sup>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位能真正改变韩国体制的更理想的韩国领导人；金大中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振臂呼吁的改革，其实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欲为——金大中尤其致力于打破国家、银行和大企业财团之间牢固的裙带关系。<sup>6</sup>就在1998年2月末就职之前，金大中将劳工参与政治合法化，并将劳动联盟、政府以及企业领导人召集在一起进行高层磋商，这在韩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一成功举措不仅实现了韩国劳工运动长期追寻而不得的一个关键目标，并且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鼓励了经验丰富的劳工领导人去规范、监督金总统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去摧毁之。自此以后，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规约着金总统及其政党，使其每一项动议都必须付诸彻底的（且常常是否决性的）民主论辩，但从未有任何哪怕勉强可以和曾经困扰过连续几个独裁政权的混乱相比附的事情发生。2000年，韩国经济重新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2001年，尽管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韩国经济的增速开始减缓，但是仍然远远好过深受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影响的其他亚洲国家。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西方主流金融分析家和政治分析家有一种主导性的观点：亚洲经济之所以遭受了1997—1998年的危机，是因为其“权贵资本主义”：市场极不规范，常常伴随着“道德风险”；因此，亚洲国家的不二选择乃是放弃以任何一种东亚方式追求富强的想法，转而追随由开放市场、公开透明、“法治”所定义的西方模式。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新普世福音”<sup>7</su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其全球代表，在199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席卷了整个政治—经济评论界，而同一时段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力支持。但问题是亚洲经济“奇迹”何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污水坑？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台湾和韩国一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实体，过去十年，中国大陆先

是与其并驾齐驱，之后又实现了反超。199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占据了全球资本投放总额的三分之二（其中不包括长期不景气的日本），以及世界总产出增长额的一半，尽管这些国家只占世界GDP的20%。如果我们接受西方对1997年经济危机原因的裁定，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几十年来依据相同材料得出的完全相反的权威结论？他们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由危机引发的感觉上的逆转看上去固然令人惊叹，实则只会强化观察上的逆转，对此我将在本书第一章展开讨论。

不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确实使发展型国家模式在21世纪的走向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金融危机后，日本引领的“晚期”工业发展时代看上去已经终结，<sup>8</sup>而且，的确，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民主化浪潮已经极大地消解了官僚—威权的国家形式，我将在第三章对此展开讨论。如果当初这种官僚—威权式工业政权（BAIR）模式有效运转，致力于（在钢铁、化工、铁路、汽车等领域）建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健肌体，那么它必将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或信息时代）缘悭一面。但是正如梅瑞迪斯·卡明斯（Meredith Woo-Cumings）指出的那样，1997年以来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主导的，而西方法制的金科玉律很多时候倒更像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计谋，为的是打开亚洲市场和企业，让更为强大的西方银行和财团进行掠夺性竞争和并购。<sup>9</sup>因此，在日本经济重新恢复持续增长、我们得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之前，似乎不宜对发展型国家做出任何终审裁定。

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将会是商业报刊时事评论栏目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过，日本民众显然对这一问题更为关注。过去十年中，日本内阁频繁更迭，平均每隔十四个月就要更换一次首相，这让日本民众不堪其苦，终于（在1993年）直接威胁了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统治。就像最终找回了神灯的阿拉丁，日本经济的决策者们不停地摩擦同一盏神灯，一直试图用同一剂奇方复兴日本经济。但连续几年将利率降低到零的做

法并没有使日本消费者变得更大方，同样，凯恩斯式政府的财政刺激经济虽然使得高速公路和子弹头列车的轨道不断延长，直达最边远的地区，却并没有阻止日本经济年复一年的衰退。2001年，来自焦头烂额的自民党的资深党魁森喜朗首相以有史以来最低的支持率（个位数）下台，仓促继任的小泉纯一郎来自同一个老迈的政党，其改革宣言却意外地为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超过了80%）。也许小泉耀眼的民意支持率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媒体运作，接下来会有一个严肃的改革方案；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咬紧牙关解决日本所面临的最糟糕的问题，即大量的、快要占到GDP六分之一的银行坏账和不良贷款（作为参照，1980年代美国信贷危机的比例是3%）<sup>10</sup>，那么等待他的也将是失败。

如果说在美国人眼里，日本已经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迅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的威胁，那么这种不期而至的结果似乎并没有让日本人感到困窘。如果能有一个普遍调查的话，那么一定可以说，在21世纪（前不久被封为“太平洋世纪”），日本不会再提出争当发达工业国家“老大”的种种诉求。毕竟，千年“老二”并没有什么不好：有和平的国家安全环境（因为有美国人在这个地区——且不说全世界——充当警察）；取得了战后最了不起的成就——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这个国家六十五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十五岁以下的人口，但老年人并不为医疗保健和退休金问题担心。午夜时分，东京的灯火辉煌依然像衣冠楚楚的护卫，照看着酩酊大醉的“工薪族”回家时的踉跄脚步；清晨，一尘不染的街道上，成群结队身着制服的少年无忧无虑地走向学校。一边是承受着火星探测计划（见第一章）无限期受阻之痛的日本，一边是享受着新自由主义繁华盛世的美国，似乎用不着再去追问，谁是1980年代竞争的赢家。

如果将朝鲜与其宿敌美国的关系比作一条弹道，那么这条弹道依然在沿着本书第五章所描述的轨迹前行。事实证明，平壤不仅想以其耗资不菲的核反应堆为筹码寻求与华盛顿的新关系，同时还想以其中程和远

程导弹进行同样的交易。克林顿当局很晚才破解这一秘密，直到1998年年中，总统才愿意听取更新对朝关系的建议。建议者主要是指巡回大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博士——他受命专门负责此事，但也包括政府部门一些卓有远见的官员。此后，事情进展顺利，克林顿试图将对朝关系的突破作为其总统遗产的一部分。2000年9月1日，金正日的高级军事代表赵明录（Cho Myong Rok）将军来到华盛顿，走进了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几个星期后，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创历史地回访平壤，会晤了与世隔绝的金正日，并称他是理性的（如果说离标准还有差距的话）。美国的突然之举很大程度上是“阳光政策”刺激的结果。1998年，在离经叛道的总统就职演说上，金大中首次提出“阳光政策”，其后，他又以英雄般的气概表达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将访问平壤的意愿，将“阳光政策”推向了极致。2000年1月，金大中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自1945年分治以来，朝鲜半岛两位领导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由于致力于谋求与北方和解，以及数十年来所领导的民主反抗运动，2000年，金大中总统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佩里大使长达数月连续发表评论，强调要建立美国对朝新政策，签署真正符合美国和东亚利益的导弹协定。2000年11月，克林顿对平壤的访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行若能成功，将使朝鲜的导弹计划束之高阁，而代之以双方的民主导弹（即使并不一定互派大使）。平壤已经声明准备停止所有射程超过五百公里的导弹的制造、部署和国际交易。美国谈判代表被确切告知，如果克林顿能够赏光与金正日进行会晤，金正日将同意加入导弹技术控制公约。按照公约，朝鲜所有导弹的最大射程将不能超过三百公里（这势必解除其近邻日本的心头之患）。作为回报，美国将为朝鲜提供十亿美元的粮食援助。<sup>11</sup>突然，祸起萧墙，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势均力敌的总统竞选成了此事的绊脚石。克林顿总统非常想去平壤，事实上，11月之前几个星期，他的谈判代表

们就已经整理好了公文包，然而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后来所说，对总统来说，在不能确知“是否会发生巨大的宪法危机”之前，出国绝非明智之举。<sup>12</sup>等到最高法院的5个法官鱼贯将票投给乔治·W. 布什后，一切已为时太晚。

1950年代，有篇文章的观点广受推崇，即所谓“侥幸拯救了台湾岛”。这种观点认为，中共的军队原已枕戈待旦，准备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几个星期进攻台湾，但军队中间突然爆发了血吸虫病，而朝鲜战争又转移了注意力，这才使得台湾逃过一劫。而2000年10月，一次发生在选举中的侥幸（与之相比，一切选举中的侥幸都难称侥幸）却将一位在普选中以五十万张选票落败的失败者推向了总统宝座，使其成为了自沃伦·哈丁和卡尔文·柯立芝以来最平庸、最不够格的总统。<sup>\*</sup>当政的前八个月，虽然没有获得美国民众任何授权，但并没有妨碍布什及其顾问们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莽撞地插手亚洲问题。问题很快便九九归一：第一场危机是否会出现于韩国、日本或者中国？正如公元2001年9月11日一样，美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纪元中。“九一一”之后，如果谁还对布什总统的上台方式耿耿于怀，那他一定是不明智的——就算不能说他是不爱国的。但是回顾这一灾难性的开端终归是重要的。

在布什就职之前，民众自认为知道他将如何应对日本（如何应对中国和韩国则几乎无迹可循）：他将给予日本以更多关注，他的顾问们说。

---

\* 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是历史上选举结果最为接近、争议最大的大选之一。争执焦点出现在佛罗里达州。由于两个主要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乔治·W. 布什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民主党人艾尔·戈尔——此前均未取得过半选举人票，因此佛州的25张选举人票将决定选举胜负，而两人在佛州的得票数异常接近。第一次投票结果显示布什仅领先戈尔2000票，第二次点算后更是下降到只有1000票。之后，民主党要求对全部选票进行人工点算，而布什则就点算程序对戈尔提起诉讼。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判定重新点算的过程违宪，因为选票重计工作并没有在佛罗里达州全州展开，并以5票对4票反对重计选票。最终结果是，戈尔虽然比布什多赢了50万张普选票（戈尔50999897票，布什50456002票），但仍由获得较多选举人票的布什当选总统（布什271票，戈尔266票）。——译注

接踵而至的果然又是一个完全超乎想象、备受关注的“侥幸”事件——尽管完全让人大跌眼镜。总统就职后三个星期，美国潜艇“格林威尔”号从威基基海滩（Waikiki Beach）启航，开始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是威基基海滩？因为小城里的不少富豪对这次出航充满了期待，他们可都是恭顺的纳税人。<sup>13</sup> 这些成群结队四处游逛的嘉宾实际上操控着指挥权，所以船长决定向他们展示一下他的核潜艇浮出水面的速度有多快，结果招致了一场灾难：“爱媛丸”号被撞沉，九名日本人遇难，其中包括四名高中生。这是一场混杂了悲剧和闹剧的事故：处置失当的森喜朗首相听到消息时，正准备打高尔夫球的第五洞，而他的决定是将球打完；布什当局则在几个星期之后才向日本民众正式道歉。它是一起必然会发生的故事，是耗费巨资却毫无用处的美国军事机器的一个绝好的象征。

诚然，很快，世贸中心的悲剧重新激起了讨论：在苏联解体已经十年，且没有另外一个对手取而代之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花费比所有基于冷战而设定的每一个军事对手都要多的、高达三千三百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同样，美国在韩国和日本的远程军事部署也一仍其旧，继续维持着十万人的军队和每年四百二十亿美元的预算。<sup>14</sup> “九一一”之前，如果你问国家安全专家：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还驻扎在那里？你最先听到的词语一定是“北朝鲜”。事实上，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所论，支撑上述远程军事部署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二战”的结束以及1940年代冷战的开始，它实则包含了双重战略目的：既扼制共产主义，又约束我们的盟友——刚刚战败的日本。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半主权国家，在国防、情报以及海上通道政策制定——这直接影响着日本经济资源的保障——等方面，都完全依赖美国。到1990年代，上述双重战略潜隐的一面已经昭然若揭，因为，欲望的伪装已经不复存在，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冲绳当地居民之间不愉快的摩擦却愈演愈烈（共有两万六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冲绳县，其中包括一万七千名海军陆战

队士兵)。大规模远程军事部署的收益日减,而费用迭增,但五十多年来,这种逻辑上完全不能自洽的战略却几乎没有任何调整,至少“九一一”之前是这样。

在那场地动山摇、撕心裂肺的事件之后,任何一个试图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或试图谈论未来的人,都不啻为傻瓜。我曾经写道:恐怖袭击中断了不断展开的世界历史;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更遑论一年或十年之后。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看清楚,受冷战驱动的美国军事和情报机器,对于解决由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面纱的自杀式恐怖分子所引发的全球问题,究竟是沉重的包袱还是药到病除的良方。对“黑色九月”的恰当回应,毋宁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求和平与和解,进而使焦点集中于由流动的恐怖分子所引发的全球问题。

且不管批评者之所言所想,相比于所有想使朝鲜半岛退回到1945年分治状态的国家首脑而言,比尔·克林顿和朝鲜半岛的两位领导人确乎更想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2001年3月,金大中总统成为了首位在白宫与布什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当时,金大中对朝鲜领导人2001年4月访问首尔及随后的平壤最高会谈充满了期待,他需要布什的支持。孰料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最终变成了一次外交灾难。金大中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其顾问公开宣称会谈结果“令人尴尬”,私下里更是对美国新任总统高声咒骂。<sup>15</sup> 布什告诉韩国领导人,他不信任朝鲜领导人(不经意间,“究竟谁不信任”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因为朝鲜没有遵守协议。晚近唯一的重要协议乃是签署于1994年的关于关闭朝鲜石墨核反应堆的协议,而布什的顾问们不得不承认朝鲜并没有违反这一协议。金正日很快中止了预定与南方的几次会晤,而首尔则不得不直面“阳光政策”的黯淡前景。

在金大中灾难性的访问之后,布什当局声称将对朝鲜半岛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以便决定如何对朝鲜采取措施。在此之前,克林顿已经率先对后冷战时期的朝鲜半岛政策进行过全面的重新评估。该评估由佩里(他

不仅是前国防部长，同时也是共和党人）<sup>16</sup>领导的国务院负责，耗时六个月而成。2001年夏天，新的评估报告完成，布什当局宣称将与平壤开启新的会谈。但评估报告也引发了若干新问题，如朝鲜常规部队的部署问题，而布什的顾问们一再声称，他们的最得意的导弹防御计划主要是针对朝鲜的。按照克林顿的方案，将朝鲜纳入导弹技术控制公约不仅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仅需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每年提供十亿美元的粮食援助；而截至2000年3月，导弹防御计划已经耗资六百亿美元。<sup>17</sup>

韩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姑以为例，恕不赘举）灵活的外交斡旋，使朝鲜重新回到了高层会谈的轨道，而在此之前，布什当局在“阳光政策”中原本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2001年9月中旬举行的一次颇为成功的会谈做出了若干决议，其中一项是在南北朝鲜和俄罗斯之间修筑铁路。要不了几年，便可以像朝鲜分治之前一样，从釜山乘火车直达巴黎。金正日释放了新的发展计划的信号，他乘坐一辆行驶缓慢的列车于7、8月间往返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段惬意的旅行使他离开平壤达4个星期之久，而这也彰显了他对权力的牢牢掌控。

美国世贸中心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朝鲜以毫不含糊的措辞予以严厉谴责，称这一事件“令人发指，是一场悲剧”，并称这一事件再次提醒全世界警惕恐怖主义的危害性：“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及对恐怖主义的一切支持活动，这一立场将永不改变。”<sup>18</sup>读者也许会说，这不过是犬儒主义的策略而已，目的只是让身处危机之中的美国将枪口偏离朝鲜，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忘记，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炸弹曾经将朝鲜北部的所有城市夷为平地，曾经炸死了虽然至今仍然未知但一定数目惊人的平民百姓。我将在第二章中对这种来自空中的恐怖活动进行简要讨论。问题是，在一个正义的世界中，对这种恐怖活动进行真诚反思并道歉，居然遥遥无期。不过，平壤的领导人已然克服了恐怖过去，并且显然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如果说朝鲜一直都是导弹防御计划的公开目标的话，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着中国及其老掉牙的、由二十一枚依赖 1960 年代技术的单弹头洲际导弹组成的核打击力量。只消动用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便足以使中国的核威慑化于无形。果真如此的话，中国毫无疑问将和 1970 年代的美国、苏联一样，在其导弹上部署多弹头，而这势必会引发新的、一发而不可收的军备竞赛。克林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而国家安全助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则将中国视为和“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庶几相似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其说是一个伙伴，不如说是一个竞争者。<sup>19</sup> 导弹防御系统很可能会将其当下的幻想转变为未来的现实。

2001 年 4 月 1 日，美国海军一架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岸线附近进行侦察时，显然是在与一架中国战斗机撞击后，紧急迫降于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罹难。中国领导人的选择是：扣留二十四名机组人员并对其展开讯问，以了解事故真相，十一天后允许他们返回美国（换了美国，也会照此办理）。飞机则被继续扣留、检查了几个星期。上述事件引发了布什政府的第一次中国危机，而媒体则不出所料，喋喋不休地大肆渲染中国人如何骇人听闻地摧残一架美国飞机，而这架飞机不过是不慎飞离其基地七千英里而已。（冷战期间，我们曾派侦察机沿苏联海岸线进行侦察，苏联也派侦察机沿我们的海岸线进行侦察，在双方都接受的游戏规则中，有一套非常纤细精微的礼仪管控着双方的活动。而中国从未派侦察机沿我们的海岸线进行侦察。）在经过了一开始的错误之后，布什当局终于放下身段，与北京进行了耐心的磋商，并最终在乔治·W. 布什及其父亲（任总统期间，他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戮力同心的努力下，解决了这一纷争。心满意足的中国将 EP-3 型侦察机送回了美国，尽管是拆解后装箱运回的。

在这次对危机的成功化解中，很少被注意到的是，在冷战早已结束、苏联也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依然以巨资维持并运转着一套侦控系